

● 西方马克思主义

意识形态理论的中心问题

——批判理论与曼海姆知识社会学的比较分析

张 离 海

(武汉大学 哲学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2)

[作者简介] 张离海(1963-), 男, 湖北赤壁人,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博士生, 主要从事西方哲学和社会科学哲学研究。

[摘 要] 在法兰克福学派对曼海姆知识社会学的批判中, 有四个反复出现的主题, 即总体性、意识与社会存在、意识形态、真理。其中, 曼海姆的社会历史总体概念被作为一种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倒退加以拒绝; 曼海姆对意识与社会存在关系的说明被说成是含糊的和没有具体决定的; 曼海姆把意识形态概念扩展到“一般的一总体的”表述被认为导致了其最初批判内容的丧失; 曼海姆知识社会学关于“相对主义”的所有断言, 被认为缺乏一个真实的真理概念, 因而注定会陷于相对主义。这四个论题是意识形态理论的中心问题, 因而也是对批判理论与知识社会学进行比较研究的核心。

[关键词] 总体; 意识与社会存在; 意识形态; 真理

[中图分类号] B089.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881X(2003)06-0726-06

总体性概念

总体性概念在曼海姆和法兰克福学派的著作中经常出现。两者都坚持认为, 不同的思想形式必须与一个更全面的社会—历史总体联系起来; 都试图通过联系在总体中的社会位置, 来阐明具体精神现象的意义。但是, 我们不能因为这种阐释程序的相似性, 而忽视他们在如何理解社会—历史总体的确定性上存在着很大不同。曼海姆的总体概念来自于西方近代的历史主义传统, 而法兰克福学派的整体概念则来自于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

由于《历史与阶级意识》(1923)的影响, 曼海姆的思想发展路程显示出一种模式, 它部分地重复了从黑格尔到马克思的转变。在他的早期论文《关于世界观的解释》(1921—1922)中, 曼海姆对总体概念的使用具有明显的唯心主义倾向, 它们已经被吸收进历史主义传统, 并且由于生命哲学的影响而发生改变。在谈到从黑格尔到马克思的转变时, 他承认马克思发现的重要性, 认为“精神形成的总体性”是“由社会进程来体现的”, 此时, 曼海姆已经从主要集中在“精神”领域转移到“精神”和“社会”领域的融合。

但是, 即使在他转变到知识社会学以后, 曼海姆的总体概念仍然显示出强烈的唯心主义的、半黑格尔式的因素。他仍然相信有一个统一的意义在历史进程中展开。虽然他常常批评黑格尔绝对知识的教条主义, 但是, 他对于一个“绝对”在历史总体中并通过历史总体实现自己这一观念仍保持兴趣。他坚持认为, 总体只能通过具体历史材料综合出来, 而不能以纯粹思辨的方式假定。但是, 曼海姆自己的总体

概念从来没有通过具体研究得以详细表述,它仍然是纯粹思辨的,没有具体内容。

对法兰克福学派来讲,马克思超越于黑格尔关键性的进步,在于从精神辩证法到实际的社会历史进程的具体辩证法的发展。马克思从真实的社会关系来理解总体,把总体概念从绝对唯心主义的框架中解放出来。法兰克福学派在他们自己的著作中,试图继续发展马克思的这一唯物主义的基本前提。

卢卡奇关于“具体总体”的黑格尔式马克思主义论述,尽管对法兰克福学派有强烈影响,他们仍然疏远卢卡奇关于无产阶级作为历史同一的主—客体观念中的唯心主义。根据他们的观点,历史不能解释为一个统一的集体主义表达,历史总体也不能根据一个统一的、预先决定的意义来描述。相反,除了有限的人类行动者给与的意义外,历史并不拥有意义。并且,只要人类是分裂的,社会进程充满盲目的看似“自然的”因果力量,历史就不能被理解为统一的集体主体的产物。

但是,和马克思与卢卡奇一样,法兰克福学派继续使用总体概念作为反对物化的重要武器。借助于总体概念,他们寻求揭示社会历史的客观结构是如何通过人类活动被生产和再生产出来的,反过来,这些客观结构是如何采取物化形式,以“自然的”不可改变的限制物的形式呈现在个体行动者面前。通过描述杂乱的事实与社会总体生活过程的间接关系,他们希望在社会进程总体背景中找到直接表象的位置,通过社会进程的总体背景,这些表象被组织起来。通过批判分析社会再生产过程的客观矛盾,他们企图揭示潜在于现存秩序中的一个更合理的社会制度的真实可能性。因此,对社会再生产的具体总体的分析为本质与现象、潜在性与实在性、真实意识与虚假意识的本质差别提供了基础。

法兰克福学派总体概念内涵的实质与发展,是与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发展为到有组织的国家控制的资本主义的转变紧密相关的。他们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总体结构和动力的观点变化,导致从政治经济批判到对技术理性批判的转变。在20世纪30年代,在法兰克福学派的早期著作中,对于进步的社会变革的内在可能性还持有相当肯定的评价,但是,在1940年后,这种乐观主义就被更悲观的观点所取代,认为国家控制的资本主义也许会证明它能够容纳自身的矛盾。无产阶级革命的幻影已经被总体控制的世界影像所取代。从那时起,批判理论分析的主要焦点转到对管理控制新机制的审查,以及这些新机制对于社会和文化生活不同领域所形成的后果。

与此形成对照,曼海姆在知识社会学中使用的总体概念显示出相当多的神正论倾向。他从来没有清楚地表述他的总体概念。在他关于总体概念的观念中,真实的社会矛盾和利益冲突被掩饰。与黑格尔关于世界精神运动的说明一样,他的总体概念漂浮在历史实在之上的抽象,它仍然是一种没有实际内容的理想。

意识与社会存在的关系

曼海姆和法兰克福学派都强调掌握意识与社会存在关系的重要性。二者都认为,思想形式是在一个更全面的社会进程的广阔背景中发展,意识作为社会进程的一个必要的整合要素而起作用。因此,意识和社会存在是处于相互构成的、辩证的关系中,是相互融合的。

在与此相关的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上,他们也有相似的论题。特殊的意识形式被说成是处于特殊的社会历史位置。但是,这些特殊的思想形式的社会前提和功能常常是隐蔽的,不被社会进程的参与者有意识地意识到。对于曼海姆和法兰克福学派而言,通过揭示这种隐蔽的前提和功能,理论实现其最重要的实践作用。由于理论的批判介入,先前在个体背后无意识地起作用的东西成为能被理性理解和控制的东西。于是,理论的关键作用与它扩大社会行动者的意识洞见和自我决定的范围相联系。

批判理论和知识社会学之间的这些相同主题,可以追溯到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对二者的影响。但是,在曼海姆和法兰克福学派的著作中,论述这些论题的方式却存在重要差别。

曼海姆关于意识与社会存在关系的论述采取的是含混的和非决定的形式。在描述知识社会学的研究程序时以及在他的实际研究中,曼海姆常常把意识与社会存在的关系还原为一种本质上是平行的关

系。不同的“思想方式”，以典型的形式介绍出来，不同的“思想方式”是与特殊的社会群体相联系的。因而，对这些不同的思想方式的内在内容的解释，由群体的社会经验来补充，这些群体传播他们的思想方式。这种分析程序构成了观念的社会根源和功能的基本分析。但是，它没有为特殊信念体系的实质性评价提供基础。

相比较而言，法兰克福学派则非常重视发展一种社会理论，并能够详细说明意识与社会之间的具体中介联系。在他们的著作中，法兰克福学派不断审查社会再生产背景中特殊观念体系的意义，希望在具体分析社会客观结构和动力的基础上，说明各种思想形式的根源，揭示这些观念是如何发挥维持或挑战现存支配关系的功能的。显然，他们对意识形态的这种分析存在着“先验”性。所以，法兰克福学派还强调对意识形态信念体系的内在内容进行实质批判的重要性。强调在特殊信念体系的内在矛盾和局限被揭露出来后，还要把这种思想中的歪曲与现存社会秩序中的客观矛盾联系起来加以说明。

由此可见，法兰克福学派对意识形态的社会根源和功能的审查以及对意识形态信念虚假性的证明所具有的实践意义，就在于应该改变导致思想的意识形态歪曲的客观社会条件。因此，意识形态批判不仅用来造成思想中的改变，而且重申改变现存社会结构的需要。

但是，在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中，理论的批判功能完全降低到仅仅在于促使意识的改变。他把意识形态理论与导致意识形态歪曲的特殊社会机制分离开来，开创了对影响思想发展的社会因素作一般性考察的先例。他常常表达一种希望，即对社会因素的分析会使各种偏见得到认识和控制。但是，在他的著作中，他却没有把揭示思想的隐蔽社会前提与改变社会的客观结构的要求联系起来。尽管他也做出了实际的努力，但还是滑向了纯粹思辨立场的倾向。

意识形态概念

在对意识形态概念的分析 and 说明上，曼海姆和法兰克福学派是有异同的。首先，二者都强调思想的历史处境特征。曼海姆强调知识的“视角”性质(the “perspectivistic” quality)，法兰克福学派则强调所有知识都与有限的人类主体经验相联系。其次，二者对知识的有效性判断，都是与它的社会根源考察联系起来，而没有完全把前者还原为后者。曼海姆经常评论，思想受环境条件限制的性质，既是真理的源泉又是真理的局限。法兰克福学派则认为，知识的根源为真理的价值判断提供了背景，但是，思想的“特殊”形式在这一背景中能够清楚地表达对真理的普遍断言。最后，曼海姆和法兰克福学派都认为有发展意识形态理论自我批判的需要。曼海姆把意识形态概念扩展到一般的总体表达，很大程度上是对卢卡奇关于“无产阶级立场”的教条式实体化的反动^[1](P.310)。法兰克福学派坚持认为，没有思想形式能免于潜在执行意识形态功能的危险。

但是，法兰克福学派强烈反对曼海姆在一般的总体的意识形态概念中所体现出的相对主义和绝对主义相融合的倾向。法兰克福学派指责曼海姆完全取消了不同思想之间根源于有效性的差别，仅仅根据思想的历史境况和视角特征，就把所有思想都说成是意识形态的。曼海姆曾经宣布“任何时代的任何政党的思想都有意识形态的特征”^[1](P.77)。他认为，无所不包的意识形态概念会弱化真实意识和虚假意识之间的所有关键性差异。曼海姆持这一观点的意图是何意，且不论。但他已做出了先验性的断言：所有知识都是视角的，因而是意识形态的，并以此先验性断言取代了对知识的真理内容的实质性评价。把意识形态与视角主义(perspectivism)等同起来，最终走向了绝对知识的概念，思想受环境和条件制约的性质，只有在与绝对的无条件的理想联系时，才被看做是一个缺点。

为了反对曼海姆对意识形态概念的普遍化，法兰克福学派认为，保持和发展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概念的批判内容是必要的。他们捍卫作为“虚假意识”的意识形态，强调意识形态批判要具体地论证意识形态信念的虚假性。意识形态应该被理解为“社会的必要幻觉”，同时，意识形态理论还应该具体地说明意识形态的形成过程。

“内在批判”(“immanent critique”)方法是法兰克福学派意识形态分析方法的核心。根据这一方法的基本假设,意识形态是根据它们自己的内在抱负和真理断言来评价的,而不是根据一些强加的外在标准。不是从外部来指责意识形态,意识形态批判承担的任务是根据它们自己的标准来证明它们是假的。在法兰克福学派的内在批判方法实践中,概念和对象之间的对立为这些内在批判标准的展开提供了背景。作为“虚假意识”,意识形态首先是虚假的信念,它的作用是为现状辩护。意识形态信念的虚假性可以通过使意识形态与它描述的实在相比较显示出来。概念与对象之间的非同一性证明,揭示出概念的局限性,暴露出它掩盖对象的真实性质的意识形态功能。另一方面,在本真的意义上,意识形态不仅仅是虚假意识,它们还包含真理的片断,意识形态批判必须恢复这些真理的片断。由于意识形态总是承诺多于它们在现实中所能实现的东西,批判能使这些超越的因素转而反对意识形态所描述的现实。在这个方面,概念的“乌托邦剩余”为当前形式中的对象评价提供内在标准。

法兰克福学派经常使用非同一性揭示(the revelation of non-identity),来发展一种概念和对象的相互批判。概念与其对象对立,揭示出的非同一性要素显示概念的有限性。对象与概念的对立,所揭示出的非同一性要素则显示对象尚未实现的潜在性。例如,古典资产阶级的自由、正义、平等的理想与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活现实是矛盾的。它们掩盖资本主义社会的真实特征,在这个意义上,这些理想成为了虚假的意识形态。但是,它们不仅仅是虚假的概念,它们自身本质上是真的,只有当宣称在现阶段它们已充分实现时,它们才变成虚假的,执行意识形态的功能。通过恢复这些概念的全部内容,批判理论宣称拥有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内在批判的有力武器。可以看出,资本主义社会的实际结构系统地阻碍它实现自己的最高理想。因此,为了实现这些理想,社会变革是必要的。在阿多尔诺的著作中,内在批判的方法达到了它最严厉的方法论上的自我反思形式。阿多尔诺尤其关心避免陷入还原分析,因为,还原分析拒绝考虑特殊的文化创造,只是涉及它们的社会根源和功能,而没有充分理解它们的内在内容。

在1953年的论文《文化批判与社会》中,阿多尔诺强调需要仔细调和批判的内在方面和超越方面。内在批判具有迷失在内在内容的详细考察中的危险,而先验批判为了揭示社会根源和功能,容易忽视内在内容的批判分析。阿多尔诺认为,两种倾向对于意识形态批判的方法论而言都是本质的。因此,改正各自缺陷的惟一方式是使两者处于一种辩证的张力之中,把内在矛盾分析与社会根源和功能分析结合起来,而不是绝对地追求一个方面而忽略另一方面。但是,在很大程度上,阿多尔诺自己的分析程序是重视考察内在内容,怀疑所有关于总体的最终知识的说法。

在法兰克福学派对意识形态概念的使用中,有三种类型的意识形态。第一种意识形态形式,它被看做经验上真,但本质上假。包括古典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和现代各种形式的科学主义,这种类型意识形态的特征是在直接表象的层次上相当充分地把握实在。但是,它不能在实在的辩证结构背景中批判地理解事实的规定直接性。第二种意识形态形式,它被看做是本质上真,但经验上假。包括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以及资产阶级自由、正义、平等的观念。这种类型代表真正的“意识形态”,它在自身本质上真,但在它自称在当前现实中已经实现上假。最后,第三种类型的意识形态形式,它仅仅起一种支配工具的作用,而不拥有在所有真正意识形态中发现的潜在乌托邦内容,包括法西斯宣传和许多文化工业产品。这一类型代表的观念,明显地起维持现存权力关系的功能,而没有提出任何值得考虑的关于真理的内在宣称。

在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的发展过程中,他们对意识形态批判方式上的强调有明显的转变。在转向技术理性批判后,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们就开始怀疑内在批判在总体控制世界的背景中是否继续具有可适用性。内在批判方法假定意识形态拥有一些真理内容,这些内容能够由意识形态批判所破译和恢复。但是,根据后期批判理论,在纯粹工具的思想形式中,日益缺乏这种在所有真正意识形态中所发现的潜在乌托邦内容,而纯粹工具的思想形式正是被控制世界的特征。就观念仅仅反映现存权力关系以及仅仅为现状作宣传而言,它们并没有体现内在批判所要求的真正批判内容。在这种情况下,法兰克福学派认为,意识形态批判必须重视观念的社会功能考察。

真理问题

通过把知识根源的考虑与有效性判断联系起来,曼海姆和法兰克福学派都寻求在社会理论与认识论之间形成一种紧密联系。两者都认为,认识总是与它的社会历史背景相联系,承认思想具有背景相关特征并不必然导致相对主义。认为,只有阐明知识与社会之间的联系,才有可能超越教条主义和相对主义的陷阱。在他们看来,曼海姆关于意识形态总体概念的一般表述不仅没有超越教条主义与相对主义的对立,仍然具有绝对主义的前设和相对主义的后果。

当从意识形态概念的“非评价性应用”转到“评价性应用”时,曼海姆被迫对“虚假意识”的决定提出特殊标准。在这种背景中,曼海姆建议,根据观念对传播它的群体的生活环境的“充分性”或“一致性”标准,观念可以得到批判性评价。尽管他强调对这种标准的“动态”应用,曼海姆实质上还是认为,信念体系是由它们对实际历史环境的调适能力来评价的。

法兰克福学派反对曼海姆的充分性标准,主要是因为它的实用的和因循的基调。在他们看来,真理概念不能降低为“任何起作用的东西”,降低为在给定的历史环境中实际有效的东西。因为,这种实用的真理标准不能批判地评价实际有效的行动所服务的目标。同时,它也忽视了对社会结构的总体模式的批判评价。在某些时代,愚昧行为也可以证明它的有效性,因此,实际的成功不能是真理的惟一标准。

曼海姆关于有效性判断的特殊标准,是与他关于互相竞争的思想立场的“动态综合”可能性的观点有关。根据这一标准,任何给定思想的真理性可以根据它是如何全面地把握动态发展的社会历史总体来断定。这种思想方法的实质,就是通过对片面的、有限的观点的批判来发展一种更全面的观点。这是从黑格尔以来的辩证理论的一个标准论题。但法兰克福学派仍然拒绝曼海姆著作中所发展的概念,认为它与形而上学的有意义的历史总体概念相联系。他们也拒绝曼海姆关于作为这种综合的潜在实施者的“自由漂浮的”知识分子的政治作用的观点。在法兰克福学派看来,曼海姆是要假定一个假的中立立场,主张纯粹从知识上来解决紧迫的社会问题和冲突。

在法兰克福学派的著作中,真理概念是作为批判的和否定的概念起作用的。根据他们的观点,真理问题的焦点可以在事实性与潜在性、真实与可能之间的张力中发现。通过否定表象的直接给与性,法兰克福学派寻求揭掉物化的面纱,揭示潜在于已确立社会秩序中的潜在性。但是,法兰克福学派在对待真实意识和虚假意识的差别上,存在不对称现象。由于强调非同一性和唯物辩证法的开放特征,他们不太可能以完全的或最后的形式教条地宣称拥有“真意识”。对法兰克福学派而言,真理主要是通过对虚假的否定赢得的。

在早期论文《论真理概念》(1935)中,霍克海默提出了评价批判理论的标准。他指出,批判理论可以根据它阐明事件实际过程的能力来判定。它对社会的本质结构和发展动力把握的有效性可以根据经验标准来确定。但是,霍克海默指出,批判理论的先验建构向度,即它对存在于现存秩序以外的真实可能性的估计,只能在实现这些可能性的斗争过程中被证实。

即使在这一篇早期论文中,霍克海默也是仔细地不把实践标准还原为纯粹的实用术语。尽管他保持理论与实践潜在统一的希望,他仍然警告道,不要忘记它们之间的差别。霍克海默坚持认为,即使在缺乏与变革实践直接联系的情况下,理论仍然可以就已确立的社会讲真话。

在法兰克福学派的后期著作中,这一观点得到更进一步强调。当关于理论与实践统一的希望消失后,批判理论的肯定和建构向度也消失了。尤其是在阿多尔诺的后期著作中,辩证法纯粹用否定术语构造,所有肯定要素都被消除。

只是在马尔库塞的后期著作中,才发展了一种关于潜在性的肯定概念。在《单向度的人》中,马尔库塞描述了他所谓的“社会理论的先验性”,基于“人类生活是值得过的,或更准确地说,是能够和应该值得过的”^[2](p. x-xi)。这一判断。理性批判的标准和客观历史有效性的断定标准能够直接从这一基本价

值前提发展而来。马尔库塞提出了几个判断不同历史“计划”的合理性和真理价值的具体标准。他主张，一个社会变革的先验计划能够通过提供如下根据来证明它对于已确立社会的优越性：第一，它必须显示，它“与展现在已达到的物质和精神文化水平中的真实可能性是一致的”；第二，它必须提供“保持和改进创造性文明成就的前景”；第三，它必须定义“在它的结构、基本倾向和关系中已确立的总体”；第四，它必须捍卫这一宣称，“它的实现为存在的安宁提供更大机会，其制度框架为人的需要和能力的自由发展提供更大机会”^[2] (P.219-221)。

[参 考 文 献]

- [1] MANNHEIM, Karl. *Ideology and Utopia*[M].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World, Inc., 1936.
[2] MARCUSE, Herbert. *One-Dimensional Man*[M]. Boston: Beacon Press, 1964.

(责任编辑 严 真)

Central Problems in the Theory of Ideology

ZHANG Li-hai

(School of Philosophy,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Hubei, China)

Biography: ZHANG Li-hai (1963-), male, Doctoral candidate, School of Philosophy, Wuhan University, majoring in Western philosophy and philosophy of social science.

Abstract: There are four recurrent themes in the Frankfurt School's critique of Mannheim's sociology of knowledge. They are totality, consciousness and social existence, ideology and truth. Mannheim's concept of socio-historical totality was rejected as a regression to idealist metaphysics. His account of the relation between consciousness and social existence was said to be vague and without specific determination. His concept of ideology was said to have lost its original critical content. And finally,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was said to be lacking a substantive conception of truth and therefore fated to fall into relativism. These four issues are the central problems in the theory of ideology which also stand at the heart of the contrast between the two theories.

Key words: totality; consciousness and social existence; ideology; truth